

# 有关传承和陋习的认识

田中 宣一  
TANAKA Sennichi  
翻译：宗晓莲

## 1. 日常 非日常 反日常

我们没怎么在意的“日常”，是由“传承”支撑的。传承是从人类社会形成时应该就已经存在的文化，只要社会继续存在，今后也会继续存在。我们可以将生活看作以日常为中心展开，不时夹入比较有规律的非日常，突然混入反日常，如此这般，不断延续。人们一般参照“俗”与“圣”的对比，试图以“日常”与“非日常”的二元对立来理解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为了正确把握生活的实态，也不能忘记“反日常”。

在这一场合，“日常”指的是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以及劳动等每天的营生，每天的生活几乎就是这些活动的重复。“非日常”指的是在固定的月日，季节，在人及群体的成长变化的关节点，按照约定俗成举行的庙会，节日，仪式等，这些也是反反复复举行的，然而不是每天反复的，所以笔者倾向于将这些活动的举行看作非日常。所谓的“反日常”，指的是不规则的，突然出现的各种灾害，事故那样的事态等，当然无需说明，战争也是反日常的。如果生活只是在日常和非日常的反复交替下不断推移，那么平稳无事，当然很好。然而有时也无法回避突然混入的反日常，就会出现令人遗憾的局面，正如历史所教给我们的那样。

### 传承和传承文化研究

那么，究竟传承是什么？我是如此考虑的：

由很多人以口头反复传播的事项(如故事歌谣，规范，伦理观等等)，通过口头或是身体行为继承的动作，技术以及互助合作的方法，以及通过心领神会而不断继承下来的各种观念。

另外，笔者认为，传承不仅仅指继承下去的内容，包括传达，继承行为本身也是所谓的传承文化。

如此这般的传承，在上文所述的日常和非日常的各种时间，场所都被广泛地认同，集团性，类型性，持续性是其特征。反日常的场合，虽然也存在可以看作传承的行动，但是所谓的反日常通常是某一事件突然发生，如何行动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作相应的判断，因此无法依赖传承。

上文中提到传承的类型性，持续性，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根据周围的情况被适当地改变，或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某些内容消失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刚才还提到被集团性地继承的特点，然而传承的团体有大小，集团本身也存在兴衰的问题。因此，传承在有着持续性的特点同时，长年累月中发生变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如上所述，在将传承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或以传承为资料进行研究时，有必要用文字对传承的内容作记录，或以录像，绘画，图像等手段将其定影。

然而，应该是从人类社会出现时就已经存在，也可能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的传承内容，由于其过于理所当然，我们对于传承的认识，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是很淡薄的，将传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体系性把握的事更是迟迟没有出现。因此，虽然日常，非日常的活动不断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然而，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将传承文化以文字进行描述，或是以绘画进行记录。

不过，我们也并不是完全什么也没记录。在庞大的传承文化中，可能只是九牛一毛，然而，以古代的日本来说，有关国家的成立的传承在《古事记》中有总结，各地的情况则以诸《风土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之后的历史时代里，贵族士大夫们的日记，游记等记录流传下来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生活。此外，应时代的需要而编纂的朝廷，大臣和武家的记载了各种仪式，制度，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的文书和法令中，也包含了很多当时作为习惯法而被传承继续的事项。

到了更进一步的江户时代，也就是17，18，19世纪，在本居宣长那样的国学者之间，出现了积极试图理解地方传承文化的意义的人物，幕府官僚屋代弘贤使用了名为《诸国风俗问卷》的问卷调查，比较各地的节日庆典，祭祀庙会等，出现了试图理解传承下来的各种事项的意义的萌芽。可能是因为处于相对比较安定的时代，还出现了菅江真澄，古川古松轩那样到各地旅行，将在各地所见所闻的日常生活进行详细记录并流传下来的人。这些记录下来的传承文化，成为贵重的资料。

这样的重视各地的传承内容，并进行记录，传承的人在当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多情况是仅仅出于兴趣本地地记录了各地稀奇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因为觉得是奇风异俗而进行记录的，仅仅是这样的水平。

到了明治时代，由研究者编纂的《人类学杂志》（《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开始刊行，对欧洲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另外，与各地的各种文物的发掘出土一起，传承也被积极地介绍，传承文化到这一时期才终于成为研究对象。然而即使是这一时期，也还很难摆脱将传承看作奇风异俗的想法，可以说，还没有达到思考地方生活中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意义的阶段。

在日本，确实实地意识到传承中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的，是明治41年（1908），柳田国男拜访九州宫崎县椎叶村时，接触了当地的日常生活及其他传承活动，意识到对研究文化来说传承的重要性的时候。此后，柳田阅览了大量的书籍，寻找其中记载的有关传承文化的内容，在将其作为研究材料的同时，如果有关心的问题，则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柳田之前，还没有人意识到传承的丰富内涵，因此，记录下来的传承资料非常之少。因此，柳田和受到柳田影响的同仁一起，对各地当时以各种形态存在着的传承进行积极地记录，并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推进研究。昭和10年（1935）前后，还对文字化记录了的传承进行分类，在明确传承文化的总体像的同时，尝试着确立相关的研究方法。至此，作为担当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学科，新的民俗学在日本诞生了。

如此这般，民俗学者奔赴各地进行更多的传承文化调查，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作为研究者间共有的研究资料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

## 2. 追溯古老传承的调查

笔者进入大学，开始关心民俗学，并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的是在昭和30年代中期，也就是1960年前后。

那时，与其他各学科相比，民俗学是一门新学科的说法很盛行。也因为此，民俗学的资料积累

还不够充分，必须到各地收集更多的传承资料。与此同时，我们还被要求在各地调查的同时，实地感受传承。笔者也不例外，开始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对调查地至那时为止还没有记录保留下来的保持当地社会运营的实在形态，庙会祭祀，节日庆典，人生过渡礼仪等进行访谈记录。然而，我们当时更热心追寻的是当时已经消失的，发生很大变化的传承的以前的模样，比起当时正在进行的传承，我们更多打听的是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战前时代，也就是说1880年至1940年左右的各种情况。

民俗学中经常说的，为了回答现在的疑问，追溯其形成路径，尽可能地明确其变迁形态，是得出正确答案的重要前提，我们这样做也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考方法。

为此，我们在自己的调查地，走访那些已经离开劳作第一线，然而经验了前一个世代的老人，打听他们青壮年时期的的经历，向他们请教经历过的各种体验。在古老传说的前一时代中，可能有着更以前的传承内容，因此想知道尽可能更从前的事。从老人的嘴里打听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各种有关从前的说法，仿佛闯入了一个未知世界似的，很兴奋，同时也找到了通过这样的活动记录，积累从前的事实的意义。当时的很多民俗学者都是这样做的。笔者觉得这样做并没有错，而且是今后也应该继续的工作。

然而，接着也产生了只是做这样的事就可以了吗，这样的疑问。为了回答现在的疑问，试图了解过去的行动，不知不觉之中，忘记了正在经验的现在。了解古老的事，更古老的事本身仿佛成了目的。即使是追溯了往昔的事，甚或是更往昔的事，然而所谓的往昔实际上是没有界限的，同时古老的记忆通常也很模糊暧昧了。是不是记错想错了呢，这样的情况也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注意到，这样的忽视当今实际情况的做法将没有什么成果。

### 3. 直视当今传承的变化

我们开始意识到，就在我们眼前，各种事态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对这些事项也必须予以关注。当时，也就是昭和30年代后半期至40年代(1960年~1975年左右)的日本，正处于高度经济成长期，机械化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极大变化，基于水稻种植农业的庙会祭祀，节日庆典也在不断变化。随着石油输入的增加，能源革命使得薪炭业无法维持，农家的炕炉也在不断消失。结婚和生孩子的仪式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更加正视这些现在的变化的样子，进行正确的记录，追究其主要原因。另外，在很多事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有一些事项却完全没有变化，那些难以变化的事项是如何传承的？其不发生变化的理由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

### 4. “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

昭和51年(1976)，我开始在成城大学工作。在逐渐了解了大学状况的过程中，笔者知道了该大学保存了“山村调查”的笔记。

所谓的“山村调查”，是从昭和9年(1934)开始的3年间，以柳田国男为中心的乡土生活研究所的同仁们分工合作，到全国六十个左右的农村，山村调查当地的传承生活，并以笔记记录保存的研究课题。

调查者们带着印刷了100个调查项目的统一的笔记，进入各自的调查村落，对可以说是至今为

止几乎没有留下过记录的当地的传承进行调查，记录，并思考。这些在同一时间，以相同的项目调查了的记录，当时谁也没有使用，只是妥善地保管在大学的《柳田文库》中了。笔者阅览后，觉得虽然在内容上有粗略细致之别，不过内容很充实的笔记很多。让这些贵重的资料一直束之高阁是何等可惜，笔者开始思考该如何将其活用。

经过与先辈老师们商谈，在同事和研究生们的协助下，开始了对“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该调查是从昭和59年（1984）开始，为期3年。昭和59年，刚好距离于昭和9年开始的首次“山村调查”五十年。在这五十年里，经历了战争，战后的混乱期，以及其后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对日本来说，此五十年是极为动荡的时代。本次调查主要是想了解，经过这样的五十年，笔记中记载的事项在各地域现在是被如何传承的，同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已有的明确的记录，将五十年前作为开始点，试图明确此后发生的变化。

## 5. 追踪调查的成果

有关“山村调查”的跟踪调查的成果，已经有公开的发表，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不多赘述。不过，正如调查前预料的，几乎是所有的事项都发生了激烈变化的预测，经过调查进一步明了了。另外，有关变化的原因也进行了各种分析，这些分析也已经发表了，这里不再赘述。

然而，战后，以政府为中心发起的各种计划，以及全国各地自治体和各地方响应这些计划而积极推行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和新生活运动被明确为变化的要因之一，坦率地说，是笔者的预想之外的。

可以说，在那之前的民俗学，对国家的政治动向，政府的政策等等不太关心。一直以来，民俗学在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同时，调查各地方的生产，生活方式，记录各地方的祭祀庙会，节日庆典，追溯婚姻的变迁，关注民间信仰等等。然而，通过这次跟踪调查，可以明白地方的各种传承，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民俗学也有必要关注这些方向的想法开始出现。

## 6. 生活改善的诸运动

所谓的生活改善运动，可以说，是指为了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由政府提出，推进诸政策，受其启发，各地方自治体，地方的各团体以及各家各户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各种创新和付诸的各种努力。是在“政府”企划，启蒙的同时，作为其启发对象的“民众”明确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努力并将之付诸于行动的运动。虽然对于改善的“善”该如何理解，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不管怎么说，生活改善是官和民结为一体，一起参加的运动。

近代以来，在各个时代背景下，推进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改善运动。然而，人们最热情地加入，成果也最大的可以说是二战后的十多年间进行的这一次运动。原因是，战败后人们的精神颓败，物质生活上也非常困乏，采取什么行动，从如此混乱的状况中站起来已势在必行，官·民都是拼了命一样地参加各种活动的。

这一时期的运动，由以下四大支柱组成。

### (1) 农林水产厅主导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

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改善农业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虽然这非常重要，不过只做这些还

不能改善农村，山村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想法下，由农林水产厅主导，推进了此运动（渔业也同样如此）。在致力于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将农，林，渔民个体的健康，家庭消费生活本身等作为独立的问题，该运动正是基于这一新思想而推行的一次实践活动。

为此，昭和23年(1948)，农林水产厅内新设了生活改善课，其内部进一步分设了居住生活，饮食生活，衣着生活，家庭管理以及保健育儿等科室。以生活改善课为中心，之前没有考虑过的农，林，渔家的衣食住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安排，家庭内女性地位的提高，家人的健康（特别是婴幼儿的健康成长）等等都被列入企划内容，从而达到总体上改善农，林，渔村村民们的生活的目标。

政府在从总体上调整制度的同时，通过考试招募，培训了生活改善普及员，实际进入各地方，对生活改善运动进行启蒙，普及。生活改善普及员都是女性（最多的时候全国有2000名以上），她们在各地巡回，召开讲习会，座谈会，说明改善生活的必要性。生活改善普及员们还积极推动，帮助由当地女性（特别是年轻的主妇们）组成生活改善小组，以居民为主体寻找需要改善的问题，并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完善了村民们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就是说，国家并不是只提出口号，发出号召，而是培养，推进地方付诸实践活动的能力。

作为其结果，根据报告，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果：

炉灶的改良    厨房，供水系统的改良    浴室的改良    保存食品及面类食品的烹饪水平的提高    小家畜家禽(山羊，鸡)的饲养(为了得到奶，蛋)    农忙期集体合作做饭菜活动的实施以及临时保育所的开设（由此可以减轻家庭内女性的负担）    工作服的改良    苍蝇，蚊子的共同驱除

由此，人们的营养，卫生等方面都得到改善，充实，同时，通过炉灶，厨房等的改善，女性从繁重的家务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由于这些方面的成功改善，女性们逐渐有了自信，地方中有关女性的评价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 (2)新生活运动

上文介绍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主要目标是提高当时被认为是有点落后的农山渔村的生活，以及推进那里的女性在家庭内劳动的合理化等，与此对应，新生活运动则是在都市部及单位内推进，以全国国民为对象，主要是着眼于精神生活层面的改善运动。

政府机关中的主要担当机构是设立于昭和30年(1955)的新生活运动协会。新生活运动协会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民形成合理，民主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国民要以勤劳为贵，注意浪费铺张，奖励储蓄，废弃古老封建的人际关系及习俗，推奖良风善行，努力改善衣食住生活。这些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近代以来，由政府主导试行了很多次，然而，到那时为止，都没有取得什么可以称道的成果。

然而，这一次的新生活运动在实施方法方面下了很多工夫。那就是，不是由政府出面站在前面主导，而是在与地方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工作单位等团体保持充分联系的基础上，对地方的运动进行支援，推进。由地方组织，民间团体等提出需要改进的问题点，国家尊重相关团体自觉自主地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作为政府机关的新生活运动协会派遣讲师指导，启蒙发现问题，并向地方，团体提供已经采取行动的其他地方及团体的信息，举行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并对实施行动的团体予以财政援助，也就是说采取的是从侧面对运动进行支援的立场。

各地具体实施的活动非常多样，笔者对这些活动内容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 A 公众道德水平的提高 相互帮助运动 振兴健康合理的娱乐活动
- B 红白喜事的简朴化 排除生活方面的浪费行为 储蓄和家计的合理化 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
- C 日常仪式, 习惯的改善 迷信, 陋习的打破
- D 衣食住的改善 保健卫生面的改善 消灭蚊子和苍蝇运动
- E 有计划地生育

D的内容与生活改善普及运动及下文提到的保健所的活动有重叠之处, 其他都是只是新生活运动推行的活动, 下文(4)中提及的公民馆协同进行的活动也有很多。虽然不是马上显示出效果的内容, 然而逐渐影响了地方社会的传承活动。

### (3)保健所的活动

以保健卫生为中心, 负责改善国民生活的是厚生厅, 在各地方, 则是以保健所为中心进行活动。保健所主要做的是结核病的对策和传染病的预防, 母子保健, 改善营养和食品卫生以及有关公众卫生的问题等。

然而, 不改善生活方式, 生活环境等就无法改善上述问题, 因此, 保健所也积极参加了生活改善运动。农山渔村的保健, 育儿方面的改善工作, 由于与生活改善普及运动相关, 在各地方都已经开展, 实现没有蚊子, 苍蝇的环境也与新生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致力于维持, 提供国民的健康状况以及改善地方的保健卫生情况的保健所的工作, 有着极大的意义。

### (4)公民馆的活动

公民馆是文部厅管辖下的社会教育设施。为了进行民主主义的启蒙和普及, 废除封建思想, 公民馆积极推行了公民教育, 并开展地方教育文化活动。在这里, 同样存在如果不改善生活本身就很难取得成果的问题, 因此, 最初时, 也积极开展了卫生活动, 婴幼儿的定期健康诊断, 公共浴场, 共同做饭, 公民馆结婚仪式, 保育托儿活动等有关生活福祉的活动。因此, 对作为改善对象的地方民众来说, 上文所述及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 新生活运动, 与保健所所开展的活动有着相似之处。

不过, 对于封建思想保留较多的地区来说, 积极促进了居民的生活解放, 地方民主化活动的公民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 正如下文将要述及的, 为了实现结婚仪式的简朴化而实施的公民馆结婚仪式也是不可忽视的。

正如上文(1) - (4)所综述的, 可以说, “官”方的生活改善运动主要由四大支柱组成。因此, 本文中使用了生活改善“诸”运动这一说法。

不过, 理解这些运动的意图, 并积极付诸于实施的地方民众, 并没有对这些运动进行明确区分, 而是将此作为同一的生活改善运动理解, 实施的。

其结果是, 总体上来说这些运动的目标基本达成了。目前, 农林水产厅内的生活改善课已经废止。新生活运动协会也改变名称, 进行了新的活动。保健所, 公民馆则作为地方的重要设施继续存在, 然而不再以生活改善为主要活动目的了。

## 7. 诸改善活动中有关陋习的认识

从人类社会出现就应该存在的传承这一文化, 对社会的形成和维持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存在。虽

然与非凡的思想，大发现，大事件相比较，在创造性特征，领导世界的能量方面有所欠缺，然而在维持社会的安定方面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虽然确实在慢慢发生变化，不容易变化也是其主要特征。

上文中提及的政府有关生活改善运动的各种政策，对各地方一直以来的传承活动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可以说，以政府认为是“善”的方向试图对地方的很多传承活动进行了改进。从具体活动内容来说，政府认为是“善”的，包括卫生的，健康的生活环境，金钱方面物质生活的安定，互助合作的精神，合理性的思考等等，试图将人们的生活向这样的方向引导。这也是一般的事项，所以笔者也理解。

然而，如果以这些为“善”，那么该如何看待诸如下例的各地传承活动。例如，祭祀庙会，节日庆典等仪式中的浪费及仪式性的偷窃，集会时的冗长拉杂的闲聊，杂谈，对寺庙神社的过度祈愿，各种消灾仪式，婴儿出生后的各种仪礼，以及婚礼，葬礼时的各种赠送习俗等等。从改善运动的立场来说，这些也应该是改善的对象，然而如果将这些活动一律视为陋习，马上进行强制性的改善，地方的民众可能会觉得生活干燥无味。即使在该地域之外的人看来可能是浪费，不合理的，然而对当地人来说，是让生活充满活力的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代代相传下来的。诸如此类可以说基于各地方的伦理，长期以来已经刷入当地人心底的各种风俗习惯，推进政策的人也必须对此保持理解的态度。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打着“善”的大旗，对这样的传承进行强行改善，地方居民必然人心动摇，甚至导致人们的反抗。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定可能就会比较困难。现实生活中，祭祀庙会时的浪费似乎有所复活，婚礼的简朴化也很难说已经得到理解并实行。人们对非生产性的手工制品的看法也有变化。另一方面，地域内的互助协同精神在减少的感慨之声不时可以听到。民俗学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虽然有必要思考，不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不存在绝对的基准，民俗学也没有能力给予裁定，或是给其指明方向。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关注，对于那些自己的传承被看作必须改善的“陋习”而被指导的人们来说，为了真正过上精神愉快，物质富裕的生活，各个人到底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为什么拒绝，对于持续至今的传承，只是改变其中的什么方面。通过对这些活动的观察，分析，努力正确理解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向。

